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五辑

赵逵夫 主编

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5辑 / 赵逵夫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325-8316-4

I. ①先…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文集②文化史—中国—先秦时代—文集
IV. ①I206.2-53②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4343 号

先秦文学与文化(第五辑)

赵逵夫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惠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300,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316-4

I · 3133 定价: 4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顾 问 饶宗颐 李学勤 裘锡圭 夏传才
 谭家健 崔富章 宋兆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华	王 辉	王 锸	王震中
方 勇	方 铭	过常宝	伏俊琰
刘跃进	刘毓庆	池万兴	李炳海
汪受宽	张文轩	张崇琛	张新科
林庆彰	罗家湘	周玉秀	周建忠
郑杰文	赵生群	赵逵夫	赵 辉
祝中熹	贾海生	晁福林	钱宗武
徐正英	徐志啸	郭建勋	黄怀信
彭 林	韩高年	傅道彬	

主 编 赵逵夫
执行编辑 董芬芬

目 录

- 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 赵逵夫 (1)
- 先秦骈偶之孕育与萌生之探讨 / 谭家健 (14)
- 礼仪文献的世俗化之路 / 过常宝 (35)
- 《尚书注疏汇校》四记 / 杜泽逊 (47)
- 《礼记》版本述略 / 王 铎 (64)
- 《尔雅》非《鲁诗》之学辨 / 赵茂林 (75)
- “何休学”解 / 黄圣修 (86)
- 《左传》《国语》成书先后问题述评 / 谢小刚 (106)
- 《楚辞·天问》“悟过改更”新证 / 孟蓬生 (124)
- 郭晋稀先生“再生声母说”论析 / 周玉秀 (132)
- 从《尧典》“光被四表”说开去 / 祝中熹 (149)
- 楚系简帛“心部字族”与先民的思维观念意识 / 雷黎明 (171)
- 《韩子》的艺术特征 / 林徐典 (185)
- 商君兵法考 / 张林祥 (208)
- 20 世纪以来英美学者《庄子》文本研究综述 / 于雪棠 (218)

墨学与周道：先秦儒墨关系的一种文化审视 / 王 刚 (234)

《新序》的文本性质及其价值新探 / 马世年 (266)

商人地祇的层级及其空间分布情况浅析 / 高建文 (278)

论“鸞刀”的形制及其文化内涵 / 井 超 (296)

丝路之植物香料 / 朱春慧 (304)

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即引起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与革命先驱者的重视,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有同马克思主义相通、相合的因素。儒家思想从汉代以来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过去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认为孔子、孟子的哲学思想属唯心主义,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其中也有唯物的成分。战国时儒学中 with 思孟学派对立的荀况一派上承子弓(冉雍)之学,治国理念上注重礼又注重义、法,其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其理论更接近现代科学思想,有利于科学发展。对古代文化遗产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作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联系今天的社会现实加以阐释。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传统文化 儒学 儒家 孔子 孟子 荀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时,提出要把握住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如何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他指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今天,马克思主义既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也已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传统,是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的。就目前所知,1898 年英国人李提摩太与中国人胡贻谷合作,将英

国学者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译为中文以《泰西民法志》为名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有专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作了介绍,1899年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刊登了英国进化论者颌德的《社会进化论》一书前三章的译文,其中提到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提到马克思,说他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朱执信(1882—1920)1905年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其中较具体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要点。并节译《共产党宣言》六段文字引述其中。如译《宣言》开头数句:“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其译末尾一段:“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誓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源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在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之后说:“《共产主义宣言》(按即《共产党宣言》)之大要如是。既颁布,家户诵之,而其所惠于法国者尤深。”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对马克思主义是认同的,从而给以肯定与赞扬。可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眼界开阔的分子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已经关注到马克思主义,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有益的东西。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批评》中称赞马克思“阐发真理,不遗余力”。在他的一些论著中,也多次提到社会主义,并且认为自己的某些思想即是社会主义的。孙中山、朱执信等革命先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还不到位,不确切,但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很早就对近代中国一些思想家产生了影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说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看清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从十月革命以后才传入中国。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是扎得很深的。一百多年来,它在中国的根扎得越来越深,对中国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人民革命的最终胜利,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传统的一个重

要部分。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明确地说:“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十分宝贵、不可多得资源。”这个思想同毛泽东 1938 年 10 月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的“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①,1940 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更为明确,并将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中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的重要方面。习总书记说: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这些,为我们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人提出了重大的任务。

确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他们深刻的思想及身体力行所体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即如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的三十来年中一直被批判的王阳明的心学,其实也有很多可贵的东西,如“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同时又重视人在一切社会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而反对唯条件论和机械唯物论。王阳明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明清及近代以来一大批思想家,并且深入于一般士人与普通百姓心中,对日本、朝鲜的思想界也有很大影响,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此之类,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真可谓灿若满天星斗。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也是两千多年中意识形态的主流,尽管在每一个时代有些不同的侧重、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发挥,但以孔孟为圣人与亚圣,很多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619 页。

说教是从他们的学说、言论中引申出来，则是一致的。20 世纪前半以前的文人，没有不读儒家经典的。

所以我们这里先谈谈儒家学说中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合、相通的因素。如《礼记·礼运》篇的开头说，孔子以贵宾的身份参加了年终聚会百神的蜡祭活动后，喟然而叹。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而感叹，他说：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fèn, 职务)，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认为“大道”行于世的时代即“大同”时代。联系“三代之英”(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来看，他所说的“大同”时代是指尧舜时期。当时是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的时期。这从《尚书·尧典》中可以看到当时以“帝”为中心的领导机构及权力行使的状况。又《管子·任法》中说：“昔者尧之治天下也……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会而已矣。”则当时已有一定的法规，以统一中心聚落与周围部族之行为，从先秦其他文献所述看，当时也形成了一些礼仪制度，体现出一种社会的和谐。但作为初期国家的首领，在生活上并无多大的特权。如《韩非子·五蠹》中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同书《十过》篇中说：“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孔子为什么在参加了蜡祭之后想到了尧舜的“大同”时代呢？我们读《礼记·杂记》中的一段文字即可以知道：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

郑玄注：“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劳，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饮酒燕，是君之恩泽。”蜡祭中君臣上下、黎民百姓，所有的人都十分高兴，也形成君臣同庆，上下同乐的场面，似乎其间的尊卑界线也不存在了。所以孔子认为这是圣王贤君治国中不能少的。他在参加了蜡祭之后想到尧舜的大同时代，正由于此。

《礼运》篇中在上引关于“大同”社会的文字之后，孔子把比大同社会低一个等次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称为“小康”。过去国内思想界或以为孔子的这些论述全是空想，或以为是开历史的倒车要社会回到原始社会，没有人把它从社会文明方面去考虑，更没有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联系起来。小平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卓越的示范。小平同志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称之为“小康”，二十多年以来全国在“奔小康”。因为我们这个“小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探索了几十年确定的近期建设目标，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围，那么，它的后面必然是经济高度发展，现代化程度很高、社会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写的《大同书》属于空想社会主义，但作为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家和启蒙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能广泛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苦难、罪恶、黑暗，而设想出孤立来看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社会主义相近的理想社会，也必然是受了当时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书籍的影响。只是他不可能找到达到这种理想社会的路径。这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绝缘的。

我们对儒家经典中讲的仁、义、礼、智、信等联系今天的社会现实加以新的阐释，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肯定是有意义的，而这个阐释的过程，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细节上中国化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延伸至我们生活、思想、行为各方面的过程。

汉代以后提到儒家、儒学，一般是指思孟学派，孟轲作为这一派的代表，被后世称之为“亚圣”。近代以来学者普遍以为思孟学派是比较保守，侧重于维护旧的礼仪制度的。但《孟子》中也有一些令历代最高

封建统治者丧胆的言论。如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

又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吾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这种思想放在当时世界范围之内来看，也是十分了不起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也正是继承了这些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而形成的。至于孟子说的“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是一致的。虽然世界上各个国家历史的发展都是极其复杂、曲折的，但历史最后所证明的，还是这个道理。他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这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是不在“仁、义、礼、智”的思想框架下论述之。

上面举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与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的例子来说明两千多年中作为中国统治思想的儒家的经典中，也有很多与马克思主义某些方面相通、相合的因素。近代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儒家是比较保守的，与马克思主义，与当今社会相冲突的地方最多。但即便这样，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

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 19 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①

^① 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卷，第 309—310 页。

而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中,除费尔巴哈之外,都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直接地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的内核”,而抛弃了他的机械论和历史唯心主义。所以说,对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主要是继承什么、抛弃什么的问题,不能要求古人的整个思想与其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一致。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还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以前,我们对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总结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出现简单化的倾向,不侧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细致的分析,而是着重套框框、戴帽子,分“敌我”,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如习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所以说,即使在先秦诸子与一些先秦重要典籍的定性、评价、阐释方面,也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加以审视。

仍以儒家为例,过去多认为先秦儒家除荀况之外都是唯心主义的,而其中最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是孟轲。但他所说“天命”是否就是指“上帝”的旨意也很难说。如《孟子·尽心上》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如果这“命”即“天命”,是指老天爷的旨意,那么不该死的,即使立在什么地方也不会死,该死的立在什么地方也要死。可见他所说的“命”是指自身所肩负的使命,如上有父母要供养照料,下有子女要哺育等,以及在社会、国家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像这些,应该具体地、细致地加以分析,不能只看字面,简单地贴标签。

由此说到孔子,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认为孔子是信天命的,其论证这一点最常引的例证是《论语·子罕》中说的“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和《季氏》篇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但孔子并无系统论天命的言论。联系孔子的其他言论,似乎

^① 恩格斯:《致韦尔纳·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卷,第663—664页。

他的“天”也含有客观条件、自然规律的意思在里面。如《先进》篇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他强调人事有为，强调在人事范围内的积极努力。所以有人讽刺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如果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只相信天命，他就不会想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变现状。《先进》篇的一句话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思想。子贡不安于贫困，想办法发财致富，孔子称赞说：

赐（子贡之名）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三国魏何晏注其义为“虽非天命而人偶富”，是也。皇侃引或说为“不能信天任命”，更为明了。朱熹《四书章句集解》曰：“命，谓天命。”“贫富在天。而子贡以货殖为心，则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亿而已。”生意怎样做才能赢，不是靠老天而是靠个人分析推断，肯定这种行为人的，难道是相信天命的吗？学者或以为孔子弟子而不受天命为不可能，故曲解，或解作不受天子之命，或解作不受孔子之命，或解为不作官，皆非是。

同篇中还有表现孔子不信鬼神的文字：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同篇又载：

子不语怪、力、乱、神。

可见《子罕》《季氏》篇所记孔子所谓“天”，同今天我们口头常说“老天爷”差不多，未必认为真有一个“天帝”。孔子还有一段话，也是学者们一直比较关注的：

樊迟问知（按：通“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从第一句强调把心力放在为老百姓的合理事务上这一点看，樊迟大概是从从政的角度发问的。如果从这方面说，即使孔子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在当时也不会提倡在老百姓中破除迷信。完全没有信仰的社会不是文明社会，何况孔子一直强调人要“慎终追远”（《论语·学而》）。不孝顺父母，不念祖先德业的人，也是可怕的。看来孔子的思想比较复杂，不是靠引《论语》中谈到“命”“天”“天命”的几句话就可以定性的。

我们要批判孟轲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他把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制度合理化的封建思想。但同时应该看到，他也强调了人在修养、行为、事业上的主观能动性。他主张人要有“浩然之气”。历来很多仁人志士和思想家、政治家都很推崇他的这一点。他所说“浩然之气”并非源于人身体的精气，而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培养出来的正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而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上》）每一个公民，都努力使自己精神完美，这正是建设一个富强和谐的社会所追求的。孟子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他把这种行为归之于“天”，自然是唯心的。但他利用“天”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能承担大任的人，必是经过艰苦锻炼与严重考验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天”，还不完全等同于“上帝”，而包含有“自然规律”的意思在内，与屈原《离骚》中“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措）辅。夫唯圣哲与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的“皇天”内涵相近。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要追溯至西周初年的周公旦等思想家。《泰誓》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虽然讲的是“天命”，却将它同老百姓的意思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以“天命”为外衣而以“民心”为实质。这是我们在评价古代一些思想家时应特别予以注意的。所以，我们对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继承、弘扬，要作细致的研究、分析，不能简单化。这不是摘西瓜，只取西瓜，不取石头。其实，吃西瓜也是既不能连瓜皮和瓜子都吞下去，也不能因它有瓜皮和瓜子而完全丢掉。

几十年以来，孟轲思想中最受诟病、被认为最反动的观点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对这种思想是要进

行彻底批判的。但放到今天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来看,不是就一个体的人而言,而从国家间竞争来看,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由于科技不发达,无论是一代一代的手机等通信工具,还是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还是种种电子软件产品和其他一些高科技产品,我们都得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沉重剥削,而且还处处跟在他们后面。近些年中央持续地抓教育、抓科研,大力支持科技创新、理论创新,情形才有所好转。所以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水平和培养一大批在国际上走在前面的科学家,仍然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讲的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看来孔子、孟子并非彻底的唯心主义,他们似乎是出于教化方面的原因才不明确否定敬鬼神,所以后来自命为儒学真正继承者的荀况明确地提出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有所依据,不是断裂式的发展。荀况在《非十二子》中对思孟学派的激烈批判是攻击其唯心的倾向,而大力张扬“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及“明于天人之分”等,这是凸显、发展、张扬了儒家学说中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以法制充实礼治,合理调整儒家的义利观,肯定二者的合法共存而不是只肯定“义”或将二者对立起来等等,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对儒家思想有很大推进。

对荀况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的逻辑思想等,近代以来都是被充分肯定的。但是否对荀况思想的评价已经到位?恐亦未必。至今,一些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都笼统地将“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说起于孟轲,《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又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在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矣。”孟子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个整体,人之善端受于天,为天之所赋。老子与庄周也主张“天人合一”,但《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认为人与天地皆统一于“道”,合于自然。庄子则言“无为为之谓天”。言顺应天道为之,即是合于“天”。孟轲与老、庄在内涵上有所不同。比较起来,老庄的“天人合一”更接近于唯物主义。但这当中有一个问题:人如何才能合于“天”?人要合于“道”,合于“自然”,有一个对

“天”(道、自然)的认识问题。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经验,首先应是充分认识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性质及其各方面特征,认识其相互关系与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做到高一层上的“天人合一”。人类这样不断地认识世界,按照客观规律改造世界,人的行为合于自然,又掌握自然规律,为我所用,体现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没有对大自然、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没有人类的科学探求,而只讲“天人合一”,那就如原始人一样与大自然混同为一。我国历史上这种在人与“天”“主客二分”基础达到“天人合一”的道理是到了荀况才认识到的。孟轲、老庄所谓“天人合一”所省略的那个环节,正包含着人类科学实验、观察研究客观世界的内容。《荀子》中所说的“天”,很明确指自然之天。他提出人要“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然后再“制天命而用之”。他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故错人(按:指放置人本身而不管。“错”通“措”)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况将“天命”、“物”、“时”并列言之,则“天”指大自然与自然规律可知,他以人应该“制天命”(掌握自然的规律),并加以利用。这种思想与近代科学思想是相一致的。我国之所以自然科学不发达,与中国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对土地和四季变化的依赖性有关,也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孟学派、道家都讲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关。《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体现了一种不断学习、认真讨论、细致思考、分析研究、用于实践这种科学精神,本是有益于科学发展的,但长期被局限于经典的研读和“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樊篱之中,使它的作用未能很好地发挥。从这一点来说,儒家思孟学派比起荀况这一派来,确实要保守一些。

从《荀子》一书可以看出荀况是继承了子弓一派的学术思想,以子弓为孔学正宗的。子弓即孔门“德行”科大弟子仲弓,名冉雍。其事见《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荀子·非十二子》中说:“是圣人